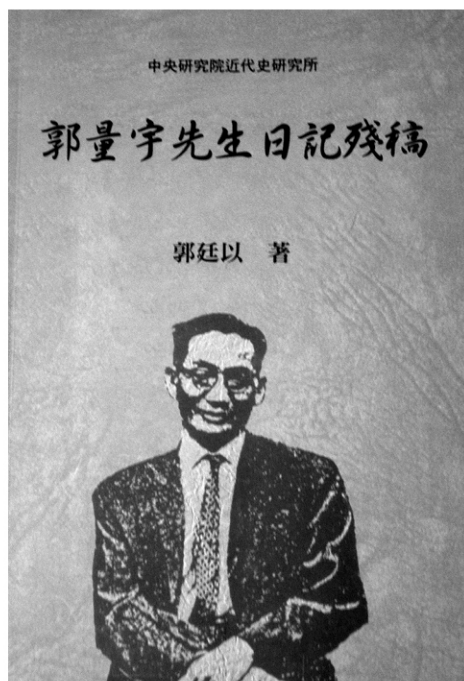


「從《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早期的發展」座談會紀要

趙席篋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封面
(圖片提供／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者郭廷以先生（1904.1.12-1975.9.4），字量宇。2012年8月該所出版《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該日記係1957-1967年之遺稿，約六十多萬字，此十年正值郭先生主持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的「黃金發展十年」。日記詳載近史所草創初期，中研院院內「北大南高」的學派歧異及與福特基金會合作之筆路藍縷過程，間由郭先生與蔣經國、李煥之交誼，探看當時國內政局之演變，極具歷史價值。

近史所為慶祝 58 周年所慶，於 2013 年 2 月 21 日以「從《郭量宇先生日記殘稿》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早期的發展」為題，在該所檔案館中型會議室舉行座談會。會中邀請所內熟知郭先生的資深研究員張朋園、陸寶千、呂士朋、張玉法、陳三井及魏秀梅分享閱讀郭先生日記殘稿的感想，及近史所慘淡經營的早期情況，遠在加拿大的王爾敏先生也寄文追憶郭先生。所內後輩研究人員近 40 人歡聚一堂，蘊含「南港學派」精神傳承之深意，是一別具意義的所慶活動。

座談會由黃克武所長主持，黃所長開場引言時指出，由郭先生的日記可以看到昔日近史所是如何在極度困頓的環境中慢慢發展與茁壯，這段筆路藍縷的過去，呈現許多歷史事實，也給予我們許多教訓。黃所長也提到，該《日記殘稿》的出版首先要感謝陸寶千先生，陸先生並特地帶來該日記原稿，交由近史所檔案館永久保存。

座談會接下來依序請張朋園先生、陸寶千先生、呂士朋先生、張玉法先生、陳三井先生及魏秀梅女士陸續發言，這幾位前輩皆在青春年少時為郭先生延攬入所，至今超過 50 年。他們生動活潑地閒談面惡心善的郭先生及其治理近史所時的過往趣事，使得座談會笑聲不斷，場面熱絡。郭先生提攜後進，指導同人整理檔案、主持學術討論會、為同人們審閱著作及用人唯才的領導風範是最為引言人所感念者，並一致推崇郭先

生是大學問家、大思想家，更是了不起的導師。以下依序節錄幾位引言人的發言內容。

35 歲入所的張朋園先生以〈從小學徒生涯說起〉為題，回憶當年在郭先生指示下，接觸了剛出版的丁文江編《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是他做研究的起點。而受益匪淺的是郭先生為他修改文字。他的前三本書出版都經過郭先生親自修改，郭先生偶爾換個字、刪掉一些「因為」或「所以」等連接詞，就讓人有畫龍點睛之妙，可謂一字千金。他是費盡心力為同仁修稿，幾乎所裡前二十本專刊都經郭先生的修改才得以出書，這種方式就如師父帶著小學徒，在他薰陶引領下漸漸走向獨立研究。閱讀郭先生的日記，瞭解當時來自外國的幫助，像福特基金會、費正清、韋慕庭等，在同仁赴美進修時，給予很多幫助。這種感懷外國友人的心思，以及郭先生對同仁的幫助與愛護，正是一種「傳承」的良好傳統。倘若我們有機會有所作為，也當以這樣的心情盡力幫助下一代學者，這也是對這些長輩學者的一種回饋。

比張朋園先生略晚進所的陸寶千先生則由郭先生日記的發現經過及由近史所出版之原由談起。他偶然間看到廣文書店從舊書攤徵集來的一批日記手稿，從字跡認出是郭廷以先生的日記。在徵得所有者的同意後，花了一年多的時間整理、謄錄、打字，勉強完成初校。該日記原是郭先生自己備忘之用，字跡潦草，有許多人的寫法或是人時地

物的中英譯名也未盡相同，他擔心有錯，不敢貿然付印，於是請黃克武所長協助，請張朋園教授、魏秀梅女士再予細校，後經黃所長提議由近史所出版。今天特地將日記原稿帶回由檔案館保存，也算是物歸原主。而當年整理《郭嵩燾先生年譜》讓陸先生獲得很多研究的金針，皆郭先生之所賜，這場師生緣分雖然淡如水，在陸先生心中卻是雋永流長。

呂士朋先生則談到近史所成立初期的艱難，所面臨的第一個阻力是史語所質疑近代史與現實政治糾葛，不是一個學術範疇。此一質疑全仗著郭先生以其專業背景、細心經營才加以消解。由日記裡可以發現郭先生與當時掌權者蔣經國先生的往來頗多，這些聯繫對近史所的幫助不小。呂先生在遭白色恐怖坐牢後，還能回到近史所工作，並有機會轉去東海任教，都是郭先生的恩情，令他沒齒難忘。當初為了家計，不得不離開近史所到東海大學教書，是他一生最大之遺憾。

張玉法先生則講了幾件當時所內的陳年往事，博得大家莞爾一笑。例如，郭先生改稿子的往事，由日記可以看到不少這樣的記載，郭先生是非常認真的改，一個字一個字地改，有時改得很生氣，氣罵對方連基本文筆都不通。經過他改的稿子再拿出來，大家都沒話說。又如，郭先生用人是沒有特殊定見，但由於那時幾乎都是大學畢業生，他覺得必須經過訓練，當時碩士也不多，那時所裡是沒有博士的。當年我們所裡唯一的碩士

是王萍小姐，郭先生非常引以為傲，每次有外國學者來訪近史所，就一定會介紹她是威斯康辛的碩士。後來李國祁先生由所內出國去德國讀博士，郭先生非常高興，不斷與他聯絡。在那時期所裡聘了兩位博士，分別是李國祁與陳三井。

陳三井先生則追憶郭先生與所內人事，表示當時所內確是有一等公、二等公。二等公就是後來所謂的「三公」，然後是三等公，臨時人員都是小卒子。郭先生用人不拘門戶，他的兩個管道一是師範大學的學生，另一個管道則是來自臺灣大學的學生，除了歷史系，還有法律、外文等科系。再來是政治大學的系統，也有邊政系的學生。他還會聘用一些通家之後，即他同輩人的孩子，當時不少外省第二代的子弟加入所內。郭先生是非常愛才的，當時有些人是毛遂自薦而來。另外，陳先生認為專刊的前 30 號都經郭先生修改過。據日記資料，曾有書稿一個月內前後經過 11 次修改，郭先生修稿常是很痛苦的，替李毓澍改稿時，不無感慨的一再表示，該稿材資取捨，及文字本身，均有問題，導言之部分欠妥，文字亦不甚乾淨，又說：「甚感吃力，文字表達技術實太差」，最後才如釋重負的說：「改稿完畢，仍不能令人滿意」。據郭師母私下回憶，郭先生深夜看稿，看到一肚子氣時，常常把書稿往地板上一摔，待翌晨醒來再揀起，某些專刊便是在摔摔復揀揀中磨練出來的，可見他要求很嚴格。此外日記中郭先生談許多包

括政敵、同仁的勤惰等等，是很值得大家仔細推敲閱讀。最後陳先生拋出了一個議題是：既有日記，史料也出版不少，是否到了為郭先生出年譜的時機？再兩年是六十週年所慶，若能同時出書，這也是對本所與郭先生的最好獻禮。

王爾敏先生撰〈郭量宇先生與《大陸雜誌》之創刊〉一文，由張力先生代為宣讀。（詳文見本刊文稿）

協助校對《日記殘稿》的魏秀梅女士說，在校對郭先生的日記時，不少往事重現，心中真是感念甚深。郭先生雖然很嚴肅，其實對女性同仁頗為親切，原本近史所只有王萍小姐一位女性研究員，自魏女士與李金治加入後，其後也陸續增聘不少女性。在緬懷郭先生的同時，也希望能將他對待同仁那樣的心血繼續傳承下去，有能力時不妨給年青人多一些機會。

黃所長最後總結指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55 年在臺開所，不僅開始了學界另一新的研究學門，亦啟動了臺灣與美國學術交流合作關係。草創初期，郭廷以先生

不畏中研院內「北大南高」的學派歧異，運用與蔣經國、蔣廷黻之私誼，披荊斬棘，開啟了臺美學術合作雙邊關係，為近史所奠定穩定發展之初基，亦開創了底蘊紮實、穩健之「南港學風」。「郭先生日記」經由舊書攤轉回近史所，直到現在能夠出書問世，也算是段奇緣。黃所長回憶前幾年有機會和張朋園先生去北京拜訪郭先生公子，獲贈大量郭先生的書信、文稿，目前都保存於檔案館。至於要如何出版郭先生年譜，將再跟陳三井先生請教。此書出版後，黃所長常置於案頭翻閱，一方面感受近史所早期發展的歷史與當時的時代脈動，像蔣經國先生與郭先生的往來；其中提到很多胡適先生及兩人之間的互動，同時也有許多當時人事物的發展與學界往來情況。更讓人感動的是郭先生為這個所付出的心力，那種看了摔，摔後又揀回，點點滴滴的嘔心瀝血，才有今日所謂「南港學派」的形成。現在能做的就是「傳下去」，繼續將近史所的優良傳統接續下去。